

武汉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武汉文史资料

(选 辑)

第 二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一年三月

武汉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国营湖北省新生印刷厂印刷

内部发行

1981年3月

书刊编号：鄂内字第0038号

字 数：137,000

定 价：0.70元

答 读 者

《武汉文史资料》自创刊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认为这是“为我市提供了一本能够集中反映武汉近代历史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读物”，“填补了我市在文化出版方面的一项空白”，因此，第一辑发行后，仅一个多月时间，销售量已超过万册。最近，有不少单位和读者来信，问及本资料以后的编辑内容和出版安排。我们对读者的热情关心除表示感谢外，现将有关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本辑是一本长期出版的资料性书刊，基本上坚持每一季度出一辑；另外考虑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适当增出专辑。今年安排出五辑（即二至六辑）。内容大体是：第三辑结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以选发有关革命史料为重点，其中有武汉党组织建立初期的回忆，有革命烈士何功伟惨遭捕害的详细经过，有“二十八个半”的来龙去脉，以及制造“六一惨案”的内幕等。第四辑结合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以选发有关武昌首义的史稿为重点，其中有辛亥老人参加首义的亲身经历，有多次会见孙中山及孙中山来武汉的情况回忆，还有目睹彭刘杨三烈士英勇就义的实况。第五、六辑，以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为重点，连续选发有关沦陷时的武汉史料。其中有武汉沦陷时期国民党各种潜伏特务组织的活动内幕，有汉奸政权的演变情况，以及有关日本宪兵队、黄卫军、维持会、伪警察等罪恶活动。从第三辑起，每辑在突出重点的同时，还将继续刊登著名汉剧演员陈伯华的艺术生活回忆录和有关地方戏的其他史料，还选发武汉的工商、文教、社会等方面的重点史料。每一辑约十五万字左右。现已开始办理征订手续，欢迎各单位和广大读者购阅，并请批评指正。

《武汉文史资料》编者

目 录

江汉军区域工部在武汉解放前地下工作的一页

-余 杰 (1)
- 武汉解放前夕我们是怎样对三府两局进行策反的
.....张式训 谈 瀛 吴先铭 郑桓武 (31)
- 武汉“和平运动”始末记.....艾毓英 (55)
- 战斗在敌人包围之中.....吴显忠 (77)
- 忆武昌真空时的一支民众武装.....张云冕 周家泉 (86)
- 略谈汉口市的中小学“教联”.....秦仲祥 (89)
- 记《汉口外勤记者联谊会》.....陈 七 (94)

C.C.在湖北的实力派——“十人团”.....刘鸣皋 (101)

我在武汉“劫收”的前前后后

——《“四大金刚”之一的自述》续篇.....徐怨宇 (117)

不算伤心的“伤心史”

——一段脱离舞台生活的回忆.....陈伯华 (134)

汉口法租界内的种种.....汪应云 (145)

武汉第一个教会医院——普爱医院.....胡学汉 (152)

武汉大流氓——“红帮大爷”周汉卿.....明夷整理 (159)

张五婆大骗案.....樊 明 (167)

江汉军区城工部 在武汉解放前地下工作的一页

余 杰

城工部的地下工作，是我党我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一个方面。其主要的工作任务和要求，执行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和政策，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都与地方党的工作是一致的。也是要开展群众工作，可以发展党员，进行统战工作和策反活动。特别是在一个城市开辟工作时，首先还是要从我党在一切工作方面的最基本的一环着手，以进行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为起点。哪里有群众，哪里有关系，就把工作伸向哪里。武汉是华中重镇，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敌我所必争。在抗战胜利后，各方面党的组织，就有人在武汉进行工作。刘、邓大军南下后，中原军区及所属豫鄂、桐柏等军区的各级城工部门，江汉军区及所属的二、三分区和有些县的城工部门，都在武汉有工作。在武汉解放前，为了配合解放军迎接武汉解放的地下革命斗争，已经成为了广泛群众性的运动，这是与我党从多方面进行的工作分不开的。我们仅属其中之一，只是千军万马中的革命一兵，在群众性地下革命斗争的汪洋大海中，所做的工作也只是沧海一粟。浩浩长河，不捐细流，名之为“在武汉解放前地下工作的一页”，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我和黄怀贞同志，原来是由晋冀鲁豫军区域工部，于一九四六年初，派遣到武汉开辟工作的。

晋冀鲁豫军区域工部派我们到武汉来，当时虽然并未预料到迎接解放这回事，但这一措施，却是从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长期打算出发的，不在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方面与我们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另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在晋冀鲁豫，就打了两个大战，一个是上党战役，一个是平汉路（邯郸地区）战役，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战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严酷的事实，使我们在工作上不能不作“两手”准备。在平汉路战役中高树勋的起义，给我们工作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就是在紧急关头，敌人正在动摇徬徨的时候，身边有我们的人，出面拉他一把，就能使他站到人民方面来。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指示中，提出了“开展高树勋运动”，要求“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派遣出来的。按照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要求，晋冀鲁豫城工部门的工作，可以沿平汉线做到北至北平，南至武汉。由于我和黄怀贞同志抗战初期都在湖北工作过，有一些旧的社会关系，因此确定了派我们到武汉开辟工作。当时城工部直接领导我们的是陶希晋和申伯纯同志，对我们的工作任务和要求，根据对形势发展的估计和工作条件，是作过多方面考虑的。如能够应用上层的社会关系，则尽力争取进入军政重要部门，否则埋下头来搞地方工作，也就是进行党群工作。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则应运用一切合法斗争的手段，加紧城市工作，否则长期埋伏下来，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领导上这些周密的考虑，对于我们思想上作好充分准备，在以后形势发展的剧烈变化中，能够安下心来，坚定的立足

于武汉的工作，是起了决定作用的。

我们离开解放区的时候，正值下达《停战协定》和通过《政协决议》，但这只不过是蒋介石积极准备全面内战的幌子，而我们到达国民党统治区所碰到的实际，却是从关内小打，关外大打，到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爆发全面内战。当时的形势，使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原来研究过的某些中、上层关系，有的已经失势，有的知道我们的来头，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不坏我们的事，一般也可以起些掩护作用，但却十分警惕，怕为我所用。由于抗战初期我们在湖北的几个地区工作过，在群众救亡运动和统战工作中，都是出头露面过的，武汉是全省的中心，有过去的工作关系，也有过去工作中的对头，这对我们既是有利的条件，又是不利条件。所以，开始的时候，如何能在武汉安全的站着脚，就成了一个首要的难题。为着取得职业掩护，打下初步的工作基础，最早与我们建立工作关系的黄怀智、王延庆，谢敬止等都尽了许多力量。而由于战争环境的隔绝，不能及时得到党的组织领导，使我们感到更大的困难，在这方面，谢威同志曾予以很大的帮助。

在中原突围时，蔡元农、余鸣华夫妇来找我们，为他们安排隐蔽事宜。由于蔡的关系，我们这时就认识了谢威同志，他在武汉一带进行隐蔽中，联系了相当一部分突围出来的同志。在一九四七年，谢威到上海接上了上海局的党的关系，并反映了我们这条线的来龙去脉和处境情况。他从上海回来后，即和我们进行了联系，传达了党组织对当时工作的有关指示。他们当时着重于联系江汉一带突围后保存下来的组织力量，和对敌人武装的策反活动。刘、邓大军南下后，谢到中原军区联系工作时，也汇报了我们在武汉的情况和与他的关系。当时蔡书彬同志任中原军区城工部副部长，是我们的老领导，对我们的情况也是了解的。以后谢随军进入江汉，不久我即经过谢威同志的关系与王习仲一道也到

了江汉军区。在江汉军区域工部，原在晋冀鲁豫城工部工作的张箴同志告诉我：你和黄新元（即黄怀贞）的党的组织关系，都在大军南下时由我们带来了。从此我们就由江汉军区域工部直接领导。当时，江汉军区域工部的部长由蔡书彬同志兼任，张箴任副部长。在他们的具体领导下，我们在武汉继续进行地下工作，直至武汉解放。

二

我们在武汉的地下工作是怎样开展起来的？主要是靠党的政治影响、党的政策和上级组织的正确领导。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伟大胜利，推动了我们工作迅速的开展。一九四八年初，我到江汉军区域工部联系工作时，蔡书彬同志对我们工作上首要的要求，就是要开展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在这一基础上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深入到敌人内部去，进行策反活动。我学习了一些党的文件，主要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还有一九四七年十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在我回武汉时，由于安全原因，不能携带片纸只字，主要靠下功夫记熟，原原本本的分别作了传达。这不仅使大家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了武装，而且对当时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在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方针下，也都从党的政策上得到了明确的解决。如“分别对待”“首恶必办”“将功赎罪”“立功受奖”的政策，不仅使我们在如何正确对待过去作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而现在愿意靠拢我们的人，在政策上有了明确的依据，而对于他们本身也是一个有力的感召。没有党的长期的政治影响和党的政策的感召，我们的话也不会那样有力量。

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如何在原来的工作基础上，突破其局限性，乃是关键问题。为此，我们千方百计，采取了各

种办法，打开了局面。

（一）内外配合，突破局限

我于一九四八年初进出江汉军区，都经过天京潜（即湖北省天门、京山、潜江三县的简称），谢威同志当时任县委书记。那时有武汉来的一个学生叫白云（即白云天），他是经过隐蔽在张截港当教员的张月波的关系投奔到解放区来的。谢威叫我同他们谈谈，除了谈一些武汉的情形和他们本身的状况外，还具体了解到他们在武汉的一些社会关系，其中有一部分据说是思想进步的。当时这对我思想上有所启发，觉得通过细致的工作，应用已进入解放区的人的某些社会关系，来开展我们的城市工作，确是一条路子。经过对张、白等历史情况进一步的了解，当时解放区内也还有他们的熟人。为防万一，我和城工部打了招呼，说明到武汉后，拟设法与他们提供的某些关系取得联系。以后经过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们及时总结了这一“内外配合，开展工作”的经验，并报告了城工部。如朱黎路、孙昌前、杜彦桐等，都是通过这样的线索建立的关系。虽然后来因环境关系，他们都先后转移到解放区去了，但在开展群众工作中，都直接间接的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朱黎路、孙昌前当时是艺专汉口分部的学生，在同我们取得联系以前，已在学校里进行社团活动，团结了些进步同学。他们举行过“六一晚会”，揭露国民党镇压学生的罪行，学校政治空气比较活跃。“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在校外，在其他几个大专学校和一些中学生里，也联系了一部分进步同学，如王蔚林、钱明乐、何光明、钱文轩、周学南、石云华等，为我们开展各大、中学校的工作，建立了初步基础。

（二）层层串连，重点深入

在工作的发展上，一般的是由与我们建立了直接关系的人，通过各自的社会关系，分头进行工作，层层串连，不断深入。但有的由于主客观的条件，对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有一定的局

限性。我们就要根据情况，在所发展的关系中，有重点的加以挑选，建立直接联系。如杜彦桐介绍我们一些工作关系，有李少白、邹圣芾等。李少白当时在楚材中学任职，他通过社会关系，在武昌市政府、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等单位，开展了一些工作。邹圣乡当时是实验中学教员，我们具体研究他的一切社会关系，就他在学校的处境看，工作发展有限，但他的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中有不少的对象。开始时就推动他从这方面入手，在省府建设厅、华中日报、汉阳高等单位，建立了一些关系。我们从他建立的关系中，挑出省府建设厅的张百熙，建立直接联系。后来张在省府的各厅处和高等法院中，以及鄂南电力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市房产管理处及粤汉铁路等一些部门，都建立了工作关系。王慧闻、马毓英等的关系也都是经他建立的。我们又在他建立的关系中，挑出王慧闻直接联系。以后王在统战工作和策反活动中，又建立了一些关系。经过这样层层串连，重点深入，使我们的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较大的发展。

（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

在工作方式上，我们也不只限于秘密串连。在有条件的地方，主要还是通过广泛的群众活动，采取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作法，广泛的进行宣传教育，团结群众，发展组织。如在武汉大学，张菊生、梁猷光、傅爱礼和一些已与我们建立了工作关系的同学，他们有的参加或主持了各种学生社团，如“风雨谈”

“凌云学社”等，有的在某些系会、院系联合会和校学生自治会中担任负责职务，有的后来又发起和参加了“海鸥剧社”“峨嵋剧社”“武大民歌社”“西北风歌舞社”等。他们应用这样一些组织形式，广泛联系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如学习会讨论时局，演唱进步戏剧歌曲，宣传党的政策，扩大进步影响。继之以选择对象，个别接触，传阅党的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觉悟，逐步达到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在其他各大专院校，如艺专、国师、商专、

华中、中华、农学院等，在不同程度上也都采取了类似的作法，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果。以后在迎接解放的那一段工作中，凡是建立了党、团、城工组和各种工作关系的机关、企业、学校等各个单位，都采取“应变”的形式，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活动。

（四）依据党的政策，发挥一切积极因素

在我们的工作中，如何正确对待过去和党有过关系，由于各种原因掉队的人，这也是个工作上经常碰到的问题。党的政策给予我们明确的依据，使我们能区别不同的情况，适当的正确对待。主要是确切的弄清其历史情况，脱党后的表现，现在的政治面目、政治态度，做到心中有数，确能掌握，则应予以一定的信任，分配其工作任务。有的人在与我们建立关系以前，就联系着有一些进步的青年群众。我们对于这一类的关系，处理得适当，对于群众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作用。我们有一些方面的工作，就是经过这样的桥梁开展起来的。根据党的政策，适当正确对待，既能保持党组织的严肃性，又能发挥一切积极因素的力量。

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我们当时对发展党的组织，始终持慎重态度，所以，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非党骨干的作用，则更为必要。在这一点上，处理得当，有利于一些方面工作的迅速发展。

（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我们群众工作的起点，就是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根据一定的对象，采取适当的方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战争形势，是地下工作同志的经常工作任务之一。组织发展也是思想先行。宣传材料的主要来源，就是靠新华社广播的战报和重要文章。当时艺专的孙昌前和商专的何光明同学，长期担负了这一工作。经常性的有《新华周讯》，还有不定期的传单。以后武大的梁猷光利用天空电离层实验室的工作方便，也搞过这方面的工作，还刻印过党章等学习文件。关锡庚当时是《星报》（后改《展

报》)的一个成员,该报内部情况相当复杂,只能相机利用所能掌握的部分版面,散布一点进步影响。主要是利用报纸的公开身份,与青年作者、读者建立联系,传阅一些进步书刊,进行宣传教育。

经过这些工作,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时,各条线建立的各种工作关系已有一百人左右,分布在学校、机关、企业等各个单位,各种不同的对象,一般都是按照发展的线索,各自个别联系。为此必须适当的组织起来。当时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在大、中学生、小学教员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先锋队”。一是中学教员、机关、企业职员等工作关系中的骨干分子,在工作上能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建立了“城工组”的组织。参加这两种组织的都是从原来的工作关系中经过挑选的。主要条件是: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城工工作的各项任务,严守秘密。在手续上,要按照提纲要求写自传、填表,经过审查批准。至于上层统战关系,策反对象及某些特殊的关系,则不搞什么组织,叫甲种工作关系。由“城工组”建立的一般工作关系,叫乙种工作关系。后来在省府各厅处和高等法院,还建立了以党员为核心,以城工组员为骨干的“新政治学会”和“新法学会”的组织。在某些部门,如警察局,一般的则利用一些旧形式,如“拜把”“结盟”之类,建立了中、下层的关系。

一九四九年初,根据城工部的指示,在青年中建立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以后在大中学生、小学教员中,就没有再搞“新民先”了。有的大学,如武大,原先发展了城工组的,以后也统一建团了。

我们虽然很早就负有发展党员的任务,但对发展党员始终是审慎的,在广泛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先后只发展了十来个党员。我们通过党员,以团员和城工组的面貌,分头联系青年团和城工组的工作。为了保证安全,各方面的组织都未建立总的领导

机构，仍按单位单线联系。武昌、汉阳方面，政法单位由张百熙、中学教员由王延庆武、大开始由张菊生后由梁猷光，其他大、中学生由张菊生、张益梅，小学教员由孙家清等同志联系。汉口方面，各机关职员、中小学教员由黄怀智，大、中学生由傅爱礼等同志分别联系。后来为加强对地下团组织的领导，又由张菊生负责联系各条线的团的工作。上层策反关系和这些组织是严格分开的，主要的关系由我们直接分别联系，还采取了派联络员保持经常接触的办法。

现在据部分材料综合统计，临解放前计有团员一百零一人，城工组员五十六人，统战、策反及各种工作关系四十七人。联系军政警特机关三十二个，工厂企业单位十六个，大、中、小学三十八个。其他外围组织“新政治学会”“新法学会”及大量的一般工作关系和所在单位均未计入。有的虽属一般工作关系之列，还是在有关的工作上起过一定作用的。如童长庆的“十兄弟”，多属汉口市警察局各分局的局长、局员，在稳定部属，维持过渡时期的秩序方面，都起过预期的作用。

三

统战工作和策反活动的深入开展，主要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政策的感召。很明显，从策反活动的发展过程来看，上层重点的突破都是在淮海战役之后。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伟大胜利，造成“兵临城下”的形势，在“飞鸟各投林”的情况下，党的政策为之指明了出路。在我们工作上，关键的一点，在于如何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而群众工作的基础，广泛的统战工作，适当的工作方法，这些都与迅速跟上形势发展，深入开展策反活动，是有一定关系的。

（一）在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基础上，开展统战工作和策反活动

统战工作和策反活动，是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也是在群众工作的配合下进行的。当时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議長是何成濬，早已离开湖北，由艾主持会务），就是通过实验中学教员邹圣芴取得联系的。邹圣芴并不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就是个我党的同情分子，以后也被捕了，住过反省院。他与艾毓英是省一师的同学。在党的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的号召下，我们通过在省参议会已建立的关系，对其思想动态有所了解。我们认为就他现在所处的地位，还是可以争取为我们做点事情的。在他们进行接触的过程中，开始时半真半假的作了些试探，邹还使激将法讲了“叶公好龙”的故事，以后才坦率地谈明。当艾有了和我们见面的要求时，就约他到邹家来。邹对我说：“我们这位老同学，过去我想见他一面都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摒驷简从，亲临寒舍，移樽就教，足见实具诚意”。以后艾以省参议会负责人的合法身份，做过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在为迎接解放，组织“救济委员会”的活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也是在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层层串联中，经张百熙建立了王慧闻的关系。王当时在汉口的中国石油公司任职，本单位的工作并无多大发展前途。但他在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工作过，大革命失败后流亡上海，与“湖北革命同志会”有关系。由于这种历史渊源，他当时在武汉有不少老的社会关系，对统战工作和策反活动的开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对夏斗寅、胡秋原、贺衡夫和杨某等上层人士都做过些工作。还串联了夏石农、龚孟贤、余义明、费侃如等一些工作关系。以后进行了帮会工作，把策反活动一直深入到敌人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系统。通过费做了李雨田的工作，李既是个青帮头子，又在稽查处担任上校职务。龚、余等也开展了对在稽查处东区办事处负责的詹某的工作，对汉口的一

些区公所也进行了工作。同时，各城工组大家动手，也在“剿总”参谋处、省保安司令部、“警司”稽查处、省会警察局、汉口警察局等部门，首先建立了一些中、下层的关系，为以后的上下配合，开展工作建立了基础。

（二）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突破重点策反对象

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但我们千方百计的在寻找对象，开展工作。而当敌人阵营土崩瓦解之际，有些人正处在犹豫彷徨之中，这时有人从中搭个桥，拉他一把，穿针引线，则会水到渠成。但这里有个互相信任的问题。有的是对党的政策尚有疑虑，有的则是对于接触他的人是否可信有疑虑。同属上层人士，不是素来深知，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这种有关身家性命的事情，也是不便轻易谈起的。在上层中有点这样的关系，不但我们信得过，而且对方也信得过的人，即使平日似乎无所作为，而到了一定时机，却能起到相当的作用。在上层人士中，各有门户，各自有互通声息能说心里话的知己，只有从各种“小圈子”的边缘上打开缺口，工作才做得进去。这一切，对当时作为重点的“两局”（省会警察局、汉口警察局）“三府”（湖北省政府、武昌市政府、汉口市政府）的策反工作的开展上，表现得很明显。

张式训当时是潜江县的省参议员。我在一九四八年初，从军区经过潜江回武汉的时候，听谢威同志谈及当地群众对他的反映还不坏，他的侄孙从乡公所拖枪起义，是他去信促成的。他的母亲还在我们的张截港住。刚刚那次从张截港送我到武汉来的是他的另一个侄孙子，我就借机去看望了他一下。当时并未深谈，但我的来路他是清楚的。有了这样点联系，到了一定时机，经过一定工作就能发生作用了。艾毓英和我们建立关系后，就经他进行联系。他与艾同住在省参议会内。在那里，对当时湖北武汉各方面的情况，政治动向，宦海风波，人物动态，情绪冷暖，都可以加以观测，悉收眼底，及时进行研究。张在上层中是个不太冒尖

的人，为人平易，和各方面的关系都不深，因此，在“各立门户”中也并不是那样对立，和各方面人士都还易接近，不大引人注目。他向我们反映了省参议员驻会委员吴先铭的一些当前动态，确定由他去对吴进行工作。张开始从“情势紧张你走不走”入手。吴则表示“抗战八年，逃亡后方，把我拖苦了。我是中国人，日本人来了，我不得不走。我现在好像落在水里的人，如果有救生圈，我一定不走”。经过这次摸底，吴的态度已很明确。不久，张则以“给送来了救生圈”为题，同吴揭开了底，与我们建立了关系。吴先铭又反映了郑桓武的情况。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态度，就是康泽任襄阳绥靖区司令时，曾约他到襄阳任职，他坚辞未就。这表现了他过去虽与他们有较深的关系，但现在比较消沉，还能辨明去就，若有所待。在何去何从方面，还是有隙可乘的。从郑桓武又连到谈瀛，据说他们的关系较好，时相过从。谈当时是新湖北日报社副社长和湖北省政府的设计委员，在上层人士中，是个善于“出点子”“动笔杆”的人，当时在某些言论上尚有好的倾向。经研究后嘱张一并留意。有一天，张急忙找我，说经过试探，他们都露底了，约我一道去谈瀛家，“趁热打铁”地与他们都建立了联系。在省、市两府改组后，经过吴、郑、谈这些桥梁，才把工作直接伸入到较有实权的“两局”“三府”的上层中去。

开展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及时了解对方的思想动态，掌握火候。不是与他相知的人，是无法窥测其内心世界的。不抓住对方的思想活动，千言万语也是隔靴抓痒。郑桓武向我们反映了蒋铭的状况，说他现在有取得武昌市长的机会，朱鼎卿想叫他干，他还在犹豫。当时我们分析，他实际上是处于何去何从的矛盾中，因此就拉了他一把，叫转告他：“如果为了做官，确实没有干头，要为人民立功，应该争取去干。”以后他很快就接任了武昌市长。为了消除他的顾虑，稳定他的思想，共商工作进行，